

盛世宏编——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办四库全书展纪实

刘明

2008年9月9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原架、原装、原函”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乔迁“新居”——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稽古厅，从此这部承载着近现代波澜壮阔而又命运多舛的历史的四库全书终于有了新的归宿。为了庆祝二期新馆正式开馆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开始面向公众开放以瞻仰其盛世之举的风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特举办主题为“盛世宏编”的四库全书专题展览。本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办，协办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浙江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等单位。在馆领导和各兄弟单位的支持下，展览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公众好评。

四库全书展从开始酝酿就具有明确的定位，即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核心进而全面介绍四库七阁的情况，包括四库纂修背景、现存四库展品和档案史料等，注重学术知识背景和传统文化普及的统一。尽管此次展览只是专题性展览，而且从开始准备展览到开展仅用了半月的时间，但无论是展板文字的撰写还是展品布置，都体现了严谨细致和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这一方面得益于古籍馆扎实的基础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积累，更为重要的则反映了专藏文献带动专题研究和专题展览的良性互动。就展板文字介绍而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既带给公众丰富厚重的知识内容，又启迪深思而唤起保护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就展品布置而言，则是学术研究在展览中的具体呈现，如把展品按照四库原本、翰林院抄本、禁毁本等类别分门布置。公众在参观展品中所获得的便不是单纯的四库写本，而是动态的四库写本纂修的历史过程。此外，各兄弟单位甚至私人藏家积极支持本次展览活动，如浙江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别送来了馆藏的文澜阁本和文源阁本，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则提供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稿本，翁连溪先生慷慨的出示了所藏文渊阁本零种等等，展览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他们的大力帮助。

总而言之，本次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得到了社会读者和高校科研院所人员的称赞，如中国中医科学研究所的郑先生说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做出这么高规格高品位的展览实在是了不起，南开大学的杨洪升副教授则盛赞能把四库中的四阁原本聚在一起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社会读者也纷纷留言，写下了他们的感受和体会，有的说：“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为我国传统文化而骄傲，为古籍被焚毁而可惜。”有的说：“能与四库全书等古代中国智慧的典章们相视，使我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展览办得很好！”还有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说如能配有定期的工作人员讲解，就更完美啦！这些评价对古籍馆是鼓励也是鞭策，争取今后办出更有水平和更有特色的类似专题展览。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纂修的古代文化典籍的汇编，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纂修的直接起因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从《永乐大典》辑出亡佚图书的建议，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随即诏令汇编所辑佚之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虽有维系满清统治和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但大规模的图书整理编纂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使传统典籍免遭毁灭的厄运。当时一共抄写了七部，即北四阁和南三阁，四库七阁的命运虽不尽相同，但却是整个清末民国社会的缩影。现存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由于抄写时间和所用底本的不尽相同，因而在版本上有一些差异。其中，文津阁本乾隆五十年（1785）方抄完，是北四阁中最晚抄完的一部，而且经过了纪昀的主持复勘，如《资治通鉴释例》补抄入阁，《干禄字书》因存在错误则重抄入阁，有些书则补画入阁等。所以，文津阁本对前三阁抄本存在的一些讹误作了修正，在卷帙篇第以及文本内容上也存在差异。研究证明，在某些方面文津阁本胜过了文渊阁本，如《扬雄法言》文津阁本多了乾隆皇帝撰写的御制文一篇，《垂光集》有些内容则是文渊阁本所没有的等等。此外，文津阁本一个值得

注意的地方是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的印章，说明至嘉庆时仍在补抄，这也是其他阁四库所没有的现象。

乾隆皇帝纂修四库与文化毁灭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清廷实行“寓禁于征”的策略，对于一部分有碍于统治即所谓不利于“人心正道”的典籍禁毁。本次展览也集中展示了禁毁本：（一）文字内容进行抽换改易，如《辽史拾遗》把涉及“虏”、“单于”等词汇更改。（二）禁止某些版本流行，如《皇明从信录》卷端有朱笔题“瘟书”二字，令人不禁捧腹而笑，禁书犹如瘟疫，读之令人生病也。（三）康熙皇帝御批的书至乾隆修四库时反而成了禁书，如康熙《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续编》，乾隆真是禁书“到家”了，令人叹为观止。（四）劈版辱尸以彻底销毁，如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足见禁书残忍之一斑。除此之外，展品中的翰林院抄本和进呈本也是一个特色，很多是作为四库底本使用的，所以在这些底本上便有一些当时馆臣的校改痕迹，包括黄签考证、墨笔批改等，如《百正集》上面有“连写不空”的批改之语；《渔墅类稿》则有很多黄签，上面写满了诸如异文校勘等的考证文字，进呈的四库底本弘治间碧云馆活字印本《鵙冠子》上面也是贴满了黄签。

鉴于文津阁四库所具有的独特版本价值，自民国时期便提出了影印以使之走出深闺为更多人识的动议，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随即派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到馆清点。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而终未能实现，这也是旧中国贫瘠薄弱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影印文津阁四库的建议正式开始实施，直到近些年来方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齐，是一件有功于当代而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

在文津阁四库全书展览之际，我们除了向纂修四库的先人们表达敬意外，也不禁缅怀起近现代那些为文津阁四库保存保护和整理研究而奔波呼吁的前辈们，他们是鲁迅、陈垣、袁同礼、徐森玉和赵万里等。借这次展览，献一杯酒，为了过去的先哲，也为了将来的人，保护好这部文津阁四库实在是一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